

# 浅谈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社会学理论

赵 宪 章

普列汉诺夫既不是专门的社会学家，也不是专门的文艺学家，但在社会学和文艺学的交叉点上，他却堪称一位卓越的艺术社会学家。鲁迅先生在谈及普氏的贡献时曾说：“他的艺术论虽然还未能俨然成一个体系，但所遗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却不只作为后人研究的对象，也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sup>①</sup>

在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下，世界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绩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从而使普氏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文艺流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是继丹纳创立文艺社会学体系之后，第一位给文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的解释的巨匠。

普氏对文艺社会学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三方面的突出贡献：

第一，“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sup>②</sup>这是普列汉诺夫文艺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胜利，一些生理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学艺术家，试图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论运用于包括文艺在内的社会生活诸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的生理本能决定的，属于人的天性；人的文艺活动源于人的性本能和潜意识，文学应当描写人的生物本能，文艺研究应当纳入生物学的范畴，等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向。这就向唯物史观的文艺社会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学名著《没有地址的信》开篇就来应付这一挑战。在他看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固然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它和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前者研究有机形态的演变和发展，后者研究社会的组织及其产物——人类的思想和感情的历史发展；前者是生物学，后者是社会学；生物学的成就有助于社会学的发展，但不能代替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恰恰开始于生物学研究领域终结的地方。普列汉诺夫认为，对于美、美感和文学艺术问题的研究，必须“从生物学转到社会学”<sup>③</sup>。

“从生物学转到社会学”，这是普氏企图把文艺做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建立唯物史观的文艺社会学的第一个响亮的口号。实际上，普氏的许多论著都无不触及到社会学中人的社会化、人的交互作用及社会组织与群体、阶级与民族等重要理论问题。

第二，注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研究文艺现象是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社会学的重要特点。普

① 鲁迅：《〈艺术论〉译本序》，《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第308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读》第五卷，第314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氏对社会心理虽然没有下过准确严密的定义,但在许多文章中都有论及,他认为社会心理是“一定的精神状况与道德状况”、“一定时间、一定国家和一定社会阶级的主要情感和思想状况”、“一切习惯、道德、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一个阶级的意向和趣味”,以及“民族情感”、“风尚潮流”、“流行情趣”等等。其基本内容是符合今天人们给社会心理所下的定义的。即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民族、一定的社区、一定的阶级或阶层自发地产生的意向、感觉、情趣、风尚、习俗等非自觉的精神状况。这种精神状况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心理定势,不具有概念化、抽象化的理论形态,是人们对周围事物的直朴的感受,一般不超出经验的范围,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实践—精神”的方式

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和文学趣味中表现着社会的心理”,“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sup>①</sup>。因此,“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与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非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sup>②</sup>。

由于社会心理在文艺研究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普列汉诺夫在自己文学研究的实践中处处渗透着心理学的分析方法。

第三,在对文艺现象进行解释和研究中,普列汉诺夫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创立了以“五层楼”公式为主要内容的文艺社会学方法论系统。

本文着重就普列汉诺夫的“五层楼”公式分析一下他的文艺社会学思想。

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为了理解艺术是怎样地反映生活的,就必须了解生活的机制”<sup>③</sup>。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学方法便体现在他对“生活机制”的理解和描绘中。他那著名的“五层楼”公式(即“五项论”公式,又称“五项因素”公式等;“五层楼”公式是艺术界的习惯提法,故仍沿用此说)便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社会结构的科学理解、对“生活机制”的形象描绘。这一公式贯穿普氏的整个文艺学说,从而使他的文艺学方法自成一家,在文艺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层楼”公式是普列汉诺夫于1892至1893年间写的《唯物主义史论丛》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此后,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1.)、《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897.9.)、《论“经济因素”》(1897年底—1898.1.)、《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级》(1900)等著作中均有论及。直到1907年,经过十五载的思考和探索,普氏终于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对这一公式作了精细而完备的表述:

“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

- (一) 生产力的状况;
- (二) 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 (三)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产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第482页、第350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sup>②</sup>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272页—273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sup>③</sup>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第496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四) 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 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五) 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sup>①</sup>。

很显然, 普列汉诺夫的这—“五层楼”公式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的具体阐释和独特发挥。它既是对人类社会的静态切片, 也包含对社会发展的动态考察。所谓“静态切片”, 就是说这一公式逐一列出了构成社会机体的五大因素: 生产力、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又译“意识形态”)。所谓“动态考察”就是说这一公式并不是五项因素的堆积, 而是根据它们各自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有机的排列组合, 从而构成由下而上、一层决定一层的“等级序列”。这一“等级序列”中的五项因素通过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形成了社会的矛盾和运动, 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生产力”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 是这一运动的最终动力。因此, 从这一意义上说, “五层楼”公式是普列汉诺夫社会学说的内核, 体现了他对“生活机制”的深刻理解, 也是他观察分析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文艺现象的总纲和基本方法。

如果我们试图从反映论的角度分析一下“五层楼”公式, 可以明显地看出, 下三层属于社会存在, 上两层属于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五层楼”公式定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那么, 被普列汉诺夫划为“思想体系”这一最高层次的文学艺术, 当然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他说: “我们说艺术是意识形态之一, 因之, 我把它和其他意识形态, 如宗教、哲学、法权及其它等等相提并论, 这些意识形态之中的每一个也都是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sup>②</sup>在“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这一命题的统摄下, 普列汉诺夫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和生活的关系, 而且还深入研究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别、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作家、作品及其它文学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他认为, 如果企图真正揭示艺术的规律, “就必须从各方面去揭露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必须善于用科学的、即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社会生活”<sup>③</sup>。这就是“五层楼”公式中所体现的文艺学方法论的第一个特点: 通过生活的解释实现文艺的解释, 通过文艺和生活相互关系的探讨实现文艺规律的探讨。

“五层楼”公式把生产力放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 把其他四项因素逐层排在生产力之上, 认为生产力是社会诸因素的最终决定因素, 因而也是文学艺术的最终决定因素。这样, 普列汉诺夫就可以从生产力的性质探讨文学艺术的性质、从生产力的发展描述文学艺术的发展。这是“五层楼”公式作为文艺学方法论的另一特点。

我们知道, 丹纳虽然发现了社会环境对于文艺的决定作用, 认为“精神文明的产物, 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 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sup>④</sup>但是, 他并没有找到艺术的终极原因。他一方面承认艺术是由人们的心理创造的, 人们的心理是随着他们的境况而变化的, 同时又认为人们的境况是由他们的心理所决定的, 于是使自己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普列汉诺夫揭露了丹纳的矛盾, 指出这是由于他把人类的智力看做是历史运动终极原因的唯心史观所导致的。“当丹纳说人们的心理是随着他们的境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时候, 他是一个唯物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 第195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普列汉诺夫和文学遗产》(俄文版)第3集, 第154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四卷, 第402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④ 丹纳:《艺术哲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主义者，可是当同一个丹纳说人们的境况是由他们的心理所决定的时候，他是在重述十八世纪唯心主义的观点”；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他们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sup>①</sup>以艺术的节奏为例，原始人在自己劳动中乐意服从一定的拍节，并且在自己的身体上挂有各种东西以便发出有节奏的响声。这种节奏是由什么产生的呢？普列汉诺夫不同意达尔文把它仅仅归结为人的生物本能的观点，而是认为“这决定于一定生产过程的技术操作性质，决定于一定生产的技术”。因为“许多生产过程的声音本身已经具有着音乐的效果”，原始人简单的音乐作品便是他们“从劳动工具与其对象接触时所发出的声音中产生出来的”。“加强这些声音，使它们的节奏增加某种花样、总之使它们适合于表现人的感情”，于是就有了音乐作品；改变劳动工具，于是就产生了乐器。<sup>②</sup>这是艺术直接产生于生产劳动的最明显的例子。

当然，普列汉诺夫又承认，艺术和生产劳动并非都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其间掺进的许多“中间环级”也在起作用。例如，宗教感情对于纹身，狩猎神话对于装饰艺术等等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宗教和神话作为社会意识归根到底还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如果在一个场合下A直接产生C，在另一场合下A通过它先前产生的B而产生C，那末难道可以因此而说C不是来自A的吗？”<sup>③</sup>

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牢牢地把住“生产力”这块坚实的基石，不仅对于原始艺术，而且对于阶级社会的艺术；不仅对于作家作品的评论，而且对于文学历史发展的研究，甚至艺术技巧方面的探寻，也都是坚定地站在这块基石之上去构筑他那文艺社会学的大厦。正如他在论述原始艺术时所说的那样，“在这个场合下，我应该坚持那决定我对人类历史运动的整个看法的原则。如果生产力的发展是这一运动的最终的和根本的原因，如果任何一个民族的生产力状况——间接地或直接地——甚至制约着他们的艺术活动，那末很明显，在我谈到原始民族的时候，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他们的生产力状况，然后再弄清楚这种状况和艺术之间所存在的关系。”<sup>④</sup>

值得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毕竟觉察到生产力和艺术之间存在着“中间环级”。在他看来，决不是意识形态的一切部分在任何条件上都是直接由生产力的状况来决定的，二者之间在更多的场合下，大量的的是发生间接的关系。特别是原始社会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其间的中间环级越来越呈现出纷纭复杂的交错现象。这时，“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的环级。”<sup>⑤</sup>

由于普列汉诺夫注意到了“中间的环级”，所以，他在考察艺术发展时，特别是在考察原始社会以后的艺术发展时，注意到了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他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诗的发展总是跟教育与生活发展并肩前进”的观点，认为在人类历史运动的过程中“一个方面的成就不仅不以这个过程的其他一切方面的按比例发展的成就作为前提，而且有时还直接造成其他某些方面的落后或甚至衰落”<sup>⑥</sup>。如十九世纪西欧经济的巨大发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第350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第339—第341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第430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第947—948页注376a。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⑤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322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⑥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四卷，第373页—第374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展，却导致了该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以及表现这个阶级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意图的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精神堕落。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生活远胜于十七世纪，但十七世纪的高乃依和拉辛的创作成就却远胜于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十八世纪英国的生产力远高于十六世纪，但十八世纪的英国戏剧却远不能和莎士比亚的时代相比拟。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便是“中间环级”在起作用。当然，“不平衡”关系的命题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明确提出，普列汉诺夫由于注意到这一问题，也就和在当时泛滥成灾的“唯经济决定论”划清了界限，从而使自己的文艺学方法更加科学化。

那么，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中间环级”指的是什么呢？从“五层楼”公式中可知，它至少包括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其中特别是人和人的关系对于文学艺术的影响尤为重要）、政治制度、社会心理等等诸因素。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艺术一方面是由生产力作为终极动因，但是有时，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二者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而是通过上述“中间环级”，特别是通过社会心理来反映现实生活；并且，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哲学、宗教、法权等也和文学艺术发生相互影响。因此，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些同文艺发生直接或较直接关系的“中间环级”“往往吸引住研究者的全部注意力”<sup>①</sup>。毫无疑问，这些“中间环级”也吸引了普氏的注意力，他对文艺的研究大多也是从这些“中间环级”入手的，通过“中间环级”的分析实现文学艺术的分析 and 批评。可见，注重生产力和文艺之间的中间因素的研究，通过“中间环级”来研究文学艺术，是普氏“五层楼”公式所体现的文艺社会学方法的最重要特点。

当然，普列汉诺夫的“五层楼”公式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公式。例如，它过多地强调了“下层”对“上层”的依次决定作用，而“上层”对“下层”的反作用则考虑的很少，甚至忽略；对每“层”中的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也研究得不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宗教、法权等对文学的影响也涉及较少。总的说来，“五层楼”仅是一个粗略的“框架”，虽然已自成一个系统，但缺乏体系的严整性和丰富性，有待于后人的研究和补充。但是，“五层楼”的框架毕竟已拔地而起，轮廓毕竟已清晰可见，作为一个方法论的构想无疑已经自立于文艺研究的百家之林了。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王 颀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第470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